

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

(讲话稿)

《理论学习》一九七五年第五期附刊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目 录

第一讲 《水浒》的成书和版本

第二讲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第三讲 两个对立的典型——投降派宋江与革命派李逵

第四讲 《水浒》评论中阶级调和论的批判

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

(讲话稿)

吉林大学中文系《水浒》评论组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关于《水浒》的重要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评论《水浒》，把历史的阶级斗争同现实的阶级斗争相对照，有助于我们认清投降派，识别修正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所作所为，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看清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的丑恶面目和反动伎俩。评论《水浒》，总结历史经验，会使我们从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有助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评论《水浒》，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肃清《水浒》研究中修正主义的流毒，有助于我们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注意和研究。

如：梁山泊起义军不是在困难重重、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遭到失败，而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胜利高潮中缴械投降，这形象地说明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梁山泊这个农民革命的堡垒正是被投降主义首领宋江搞垮的。又如：宋江和高俅都是地主阶级、封建王朝的保皇派。但是，宋江混进革命队伍，窃取了领导权，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的勾当，起到了如高俅之流的公开敌人所起不到的作用，特别具有欺骗性。再如：李逵受“义气”蒙蔽，只认“哥哥”，不认路线，识不破宋江的反动真面目，最后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等等。总之，评论《水浒》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帮助我们提高识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分清真革命同假革命，区别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能力。通过评论《水浒》这个反面教材，将使我们进一步懂得：凡是搞修正主义的，总是要当投降派；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十分警惕和善于识别在革命队伍中出现的叛徒、投降派。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投降主义。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而且对于文学、哲学、历史、教育各个领域，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事关路线，事关大局，我们要十分重视，积极参加评论，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第一讲 《水浒》的成书和版本

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封建统治阶级对外屈辱投降，对内残酷压迫，使广大劳动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其中具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有两次。一次是南方浙江一带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一次是北方山东、河北一带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水浒》这部长篇小说，就是以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但是这部小说，不是歌颂英勇威武的农民革命，不是着力表现和揭示革命农民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抗争行动，革命农民的反抗本质和革命精神，而是极力丑化农民起义英雄，歪曲农民革命，美化和歌颂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总之，作者的目的在于写招安，它的要害是投降。

《水浒》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之际，是为了适应地主阶级镇压农民革命的反革命政治需要而出笼的。元末爆发了猛烈的农民大起义。元朝统治阶级在农民革命的急风暴雨中，面临着总崩溃。它们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对农民起义进行了血腥镇压。但是，统治阶级的屠刀，并没有使揭竿而起的革命农民屈服，而农民革命的烈火却越烧越旺，元朝统治终于也在农民革命的熊熊烈火中灭亡了。《水浒》作者，站在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上，看到在对待农民革命上，只靠残酷镇压一手还不够，而必须采取镇压、屠杀与诱降招安的两手政策，交替使用。于是，以古喻今，把流传了几百年的传说故事，连缀整理成一部长篇小说，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供统治阶级镇压农民革命运动之用，作者的这种用心，为统治阶级所理解。靠了统治阶级的力量，《水浒》这部书在明、清两代广为流传。

清代有人说：“世以耐庵为海盗……盗而不海，则必为张角之盗，为朱三之盗，为黄巢之盗，为李闯之盗，扰乱治平，为天下害。”《水浒》“为王者师，万版之也可。”可见《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歌颂美化投降派宋江，完全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队伍推行反动的招安政策的需要，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宣扬孔孟之道、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

水浒故事，早在南宋已开始口头流传。从南宋罗烨《醉翁谈录》中“小说开辟”一条所记的说话目录看，已有公案类“石头孙立”，朴刀类“青面兽”，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等。到了元代，水浒故事进一步发展。宋末元初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三十六人的姓名、绰号和《水浒》基本相符，却有一点显著不同，即三十六人中有“铁天王晁盖”。宋末元初刻印的《大宋宣和遗事》中有关梁山泊故事的部分有两千多字，着重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三节，末尾写到受招安和打方腊等事，只是一笔带过。故事虽然很简略，但已具有《水浒》的雏形。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三十六员猛将”中，也有“铁天王晁盖”的名。而《水浒》的作者害怕晁盖“托胆称王”，才让他“归天及早”，而要宋江“把寨为头”，以便宣扬宋江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

《水浒》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是个大问题。因为只有排斥晁盖，才能把晁盖的“聚义”革命路线改变成宋江“忠义”的投降路线。

在元杂剧里，有不少水浒戏，其中关于李逵的戏最多。在杂剧中对梁山泊环境的描写更为具体。在这些剧本中，梁山泊的规模已由三十六人增到“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

《水浒》成书以后，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版本，多数版本在《水浒》名前冠以“忠义”二字。所有序言中，都要就“忠义”以及“盗寇”发一大篇议论，无非是歌颂皇帝如何圣明，表彰投降的盗寇如何尽忠。现在所能见到的《水浒》全本，是冠有明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的一百回《忠义水浒传》，内容有宋江受招安、征辽和打方腊。稍后的有明容与堂刻本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本，内容与天都外臣序本相同。万历四十二年杨定见序李卓吾评《忠义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则加了征田虎和征王庆的二十回内容。

明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明王朝岌岌可危。反动文人金圣叹认为“盗寇”“其罪应死”，招安之后的描写是“功归强盗”，因此他删定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七十一回本（把第一回改为“楔子”，正文共七十回），砍掉了受招安以后的部分，而另以卢俊义“惊恶梦”，梁山泊一百〇八人一齐处斩，“太平天子当中坐，谨慎官员四海分”作结尾。鲁迅对金圣叹这种作法很不满意，专门写了篇《谈金圣叹》的文章，批判金圣叹：“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稽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金圣叹的“昏庸”，首先在于他不懂得起义的农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金圣叹的“昏庸”还在于他没有看懂《水浒》作者的真正用意，作者正是和金圣叹站在同一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才塑造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形象。他没有看出宋江根本不是“盗魁”，而是地主阶级的忠实的代理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把《水浒》被砍的本子比作“断尾巴蜻蜓”。宋江投降，受招安，打方腊，这是他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把这一半砍掉，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面目就不真实了。但是清代以来，这种七十一回本却成为主要的通行本。直到解放后仍然如此，并受到为宋江唱赞歌的人们的欢迎。这实际上是掩盖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实质。

第二讲《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水浒》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是“歌颂农民起义的史诗”吗？是“革命的教科书”吗？否！它是封建统治阶级精心培植的毒草，是瓦解人民革命斗志的腐蚀剂。

毛主席明确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的要害是投降

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

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水浒》虽取材于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然而它反映的并不是农民如何向地主阶级作斗争，而是宣扬投降主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支农民起义队伍向封建地主阶级投降的全部过程。

梁山泊是《水浒》中一支农民起义队伍的根据地。最初是由“白衣秀士”王伦在那里聚集着一伙人。此人“没十分本事”又怕别人“占强”，“心地狭窄”、“嫉贤妒能”，实行关门主义，阻碍了起义事业的发展。当晁盖组织了吴用、阮氏三兄弟等“智取生辰纲”奔上梁山后，林冲火并了王伦，举晁盖为王。

晁盖做了梁山泊领袖后，实行了一条反抗封建统治、发展农民革命的路线。他们“整点仓廩，修理寨栅，打造军器”，“安排大小船只，教演人兵水手”，击官兵、掠富商，与封建统治者誓不两立，就连晁盖部下的普通将领都知道“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他们不断壮大队伍，四面八方造反好汉纷纷前来“聚义”，当时景象“好生兴旺。”

然而，《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晁盖这条革命路线是否定的。书中毫不掩饰地声称“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把宋江作为农民起义军领袖，大加肯定赞扬，以达到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目的。

《水浒》大力歌颂的宋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个宁肯当杀人犯吃官司，也不肯上梁山泊的“忠义”之士。他认为晁盖领导的农民起义，向宋王朝造反是“犯了大罪”，抗官军是“灭九族的勾当”，他自己决心不作“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不忠不孝的人。并且对要去二龙山入伙的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擒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当他因题“反诗”定为死罪、被梁山好汉抢救上山，不得不抱着“且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目的入伙以后，《水浒》作者为了突出宋江，以“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为名，架空晁盖，让宋江带领队伍三打祝家庄、攻高唐、打青州，而有意让晁盖刚刚出征曾头市，便中箭身亡，于是宋江就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篡夺了领导权的宋江，在晁盖死后第二天，迫不及待地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继而树起个“替天行道”的大旗，用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代替了晁盖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为待“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又用计赚北京有名大地主卢俊义上山，怎奈“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卢员外誓死不从，经过一番周折，终于使卢俊义坐上了第二把交椅。从此，宋江为自己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找到了一个得力助手。此后，这支农民起义队伍虽也屡屡出征，然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打击梁中书、高俅之类的“奸邪”，既“不敢侵占州府”、更“不敢背负朝廷”，对宋朝官兵也“不肯尽情追杀”，对俘虏来的宋王朝高级将领，宋江都是“亲手解缚”、“纳头便拜”，给他们“五虎将”、“八骠骑”等要职，致使起义军将领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由此在组织上得到保证。

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盼招安，望眼欲穿。菊花会上一首词倾吐了他的宿愿：“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这虽引起李逵等人的反对，但经不住宋江软硬兼

施，结果强行通过，“众人皆称谢不已”。于是宋江一面亲自求见皇帝宠妓李师师，一面给皇帝的忠实走狗宿太尉送“金珠细软”，让他们在皇帝面前多进美言，好快些求到“招安赦书”。在捉住一向与起义军为敌的高俅后，宋江“慌忙下堂扶住，请在正面而坐，纳头便拜，口称死罪”。这个口口声声只反贪官，不反天子的宋江，此时一心只想招安，连贪官也不反了。经过宋江的不懈努力，更换了三次诏书，这支队伍终于接受招安了。为了准备迎接诏书“从梁山直抵济州地面，扎缚起二十四座山棚”，结彩悬花，锣鼓喧天，杀猪宰羊，大张筵宴，尽管气氛十分热烈，然而受招安终究不是起义农民的意愿，《水浒》作者也不得不承认这点，所以，“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

投降了的宋江一伙，一旦穿上皇帝赐予的红绿锦袍，立刻打起“顺天”、“护国”旗，俨然以“天兵”自居，为宋王朝尽忠竭力。他们破辽、打田虎、捉王庆，以至主动要求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方腊，充当了封建统治者镇压农民起义的开路“先锋”、扑灭革命烈火的“及时雨”。

《水浒》中以方腊为首的江南农民起义军，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地主阶级最高利益的代表——皇帝。他们“占据八州二十五县，改年建号”，力量之强，声势之大，使宋王朝闻风丧胆。而“剿寇有功”的宋江，带领受招安的这支队伍，“替天行道”，对以方腊为首的起义军队伍，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把方腊的起义军杀得“尸横遍野、流血成渠”，并把被俘的起义军将领“剖腹剜心、滴血享祭”，方腊也被“凌迟处死、刮了三天示众。”

“方腊当刑受剐时”，便是“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的队伍已遭到血腥镇压，全军复没。梁山泊起义队伍在征方腊中搞得七零八落，死伤过半。然而《水浒》作者心犹未足，又别有寓意地安排了这样一个结尾，把投降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宋江喝了朝廷的药酒后，知道死在旦夕，却还担心李逵再去哨聚山林，坏了他“一世清名”，使他死不瞑目，因而特意派人把李逵叫来亲手药死。革命最坚决的李逵，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死在叛徒手中。作者还让宋徽宗梦游梁山泊，使宋江死犹不忘“忠义”，安排其幽魂向皇帝表功请赏。于是皇帝大发慈悲，“亲书圣旨，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赐钱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妆塑宋江等人神象。敕赐殿宇牌额，御笔亲书“靖忠之庙”。

作者认为“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小说就到这里结束了。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就得到这样一个悲惨结局。

反贪官，不反皇帝——受招安——镇压农民起义，是《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三部曲。造反为招安，招安好做官，这就是《水浒》的主题和它描写投降的全部过程。

“替天行道”是投降派的政治纲领

《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歌颂投降派。而“替天行道”就是投降派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纲领。

宋江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宋江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把这个纲领再具体一

下，那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贪官坏，皇帝好，这就是贯穿《水浒》全书的一条主线。

投降派宋江，每当俘获朝廷将领的时候，总是以一副尽忠于天子的奴才丑态，再三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他还反复招供：“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但在反动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和贪官污吏都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不过贪官是皇帝的爪牙，皇帝是贪官的后台而已。皇帝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封建官僚的总后台，在宋江看来，是万万反不得的，反了他，统治阶级就要垮台，这样，宋江想投靠皇帝，以达到“官爵升迁，封妻荫子”的黄粱美梦就做不成了。而贪官是已在朝当权，是既得利益的享受者，宋江反贪官，目的只在于和他们争权夺利，以求得利益均沾而已。这样看来，宋江和贪官同是封建王朝的奴才，他们之间的矛盾，只是“当道”与不“当道”，“专权”与不“专权”的矛盾，他们的斗争，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罢了。在维护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方面，他们却是非常一致的，都是残酷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而宋江在瓦解农民起义队伍方面，更有高俅所不能起的作用，因为营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忠于皇帝与反皇帝，是关系到能否把农民起义进行到底的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忠与反，二者是根本对立的，宋江就最害怕反皇帝，谁要造皇帝的反，他就镇压谁。李逵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宋江就厉声喝斥：“你这厮胡说”，甚至要杀了李逵的头来为令，“以警后人”。宋江对李逵反皇帝的言行如此害怕，以致在自己临死时，还要千方百计地扑灭了这颗反皇帝的火种，就是一个例证。而在招安后，对方腊农民起义军的血腥镇压，更加暴露了宋江“替天行道”的反动实质。他率领大军，水陆并进，打着“顺天”“护国”的旗帜，疯狂叫嚣“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对俘获的义军将士，宋江一反过去对朝廷降将“纳头便拜”的丑态，而杀降将唯恐不狠，不是“推出斩首”，就是“剖腹剜心”。由此就可以看出宋江口口声声标榜的“替天行道”，究竟是什么货色了。

还是鲁迅说的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孔孟之道是投降派的思想基础

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总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同历史上一切反动阶级都要乞灵于孔孟之道一样，《水浒》大力宣扬唯心主义“天命论”，把“天命论”作为宋江立身行事的思想基础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

“天命论”是儒家唯心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封建统治阶级推行反动政治路线的精神支柱，它作为“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起着愚弄和毒害劳动人民的作用。《水浒》在书中大肆宣染封建迷信、伦理道德，宣扬阶级调和论，为叛徒的投降行为蒙上一层神圣的灵光。

《水浒》在第一回中，就讲到人间的治乱祸福都是上天安排好的。历代的皇帝都是神仙降凡，专门下来“执行天意”，统治人民的。说宋太祖是“霹雳大仙下凡”，宋仁宗是赤脚大仙降于人间等等。此外则把梁山农民起义军中的一百〇八将说成是天罡地煞来世上历劫，是上天遣来人间退净“魔心”，以成“正果”的“魔君”。于是皇帝和起义军的头领，都成了奉“天命”而来的一路人，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替天行道”并打击和消灭那些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宣扬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本没有什么对立可言，两者应该握手言欢，共建大宋王朝，以完“天命”。这就是《水浒》作者在第一回中的开宗明义，画龙点睛之笔。

一部《水浒》既然建立在“天命”这块基础上，就必然宣扬造反无理，逆天有罪。正如列宁所揭露的“司祭们拚命证明农奴制是圣书赞同的”。《水浒》所拚命证明的也不外是：皇帝是“至明至圣”的，封建王朝是合理的，因而也是永恒的，不可推翻的。只有“替天行道”维护天子，除奸逐寇，以求得封建统治永世长存，才是正理。书中描写九天玄女托梦赐予“星主”宋江一部天书，指示他“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这是“天”的意志，宋江当然要身体力行，天书就是法旨，每当关键时刻，拿出来一看，就能处处逢凶化吉，转败为胜。相反，对晁盖等起义英雄的造反行为，作者则通过宋江之口斥之为“上逆天理”，是犯了弥天大罪。作者并在这方面描绘了许多“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情节，来证明他所宣扬的“造反无理”。尤其是从宋江和晁盖的不同遭遇上完全能看出作者的这个用心。宋江由于“顺天”，作者让他作山寨之主，“玄女娘娘”不但赐天书三卷，而且在危急时刻，两次授计于他，每逢生死关头，龙神土地都出来为他效劳，救他性命。即使死后，也还能托梦于“天子”，使天子御笔亲书，表彰“忠烈”。可是对晁盖却不是这样，“逆天者亡”，由于晁盖“逆天”，要造反，作者特意让他“归天及早”，当晁盖出兵曾头市，途中旗杆被风吹折时，晁盖驳斥了宋江等人关于“不吉之兆”的论调，认为“天地风云，何足为怪，”对于这个不信天命的晁盖，作者就叫他中箭身亡。两下对比，就能看出《水浒》宣扬“天人感应”的“天命论”思想是十分露骨，异常反动的。

按照儒家“天命论”的思想逻辑，皇帝是天帝之子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只有绝对效忠于皇帝，才是顺应了“天意”。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孔孟之徒都拚命地宣扬“君权神授”，并由此制定出一整套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道德，作为思想行为的规范，用来培养本阶级忠心不二的奴才，以巩固其反动统治。“忠君”思想就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核心。宋江虽然身在梁山泊，而心却在朝廷，他当然是要尽忠皇帝的，在“忠君”思想的指导下，宋江刚刚篡夺了梁山的领导权，就迫不及待地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一个字的改动，关系重大，用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代替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改变了农民革命的性质。在“忠君”思想的指导下，宋江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乞求招安，采取各种办法，甚至不惜奴颜婢膝，去走妓女李师师的后门，以求得一纸招安赦书。在“忠君”思想的指导下，宋江主动地去镇压方腊，踩着农民起义军的尸骨往上爬。这就是宋江“忠君”导致投降的必然结果，也是反动统治阶级宣扬“天命观”的重要目的。

恩格斯指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作为宋江“忠义”思想的“义”是为

“忠”服务的，同样是儒家“天命观”的宠儿，与农民起义军的“义”是截然不同的。正如晁盖“聚义”是为了造反，而宋江的“忠义”是为了投降一样，各自具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宋江正是故意混淆两者界限，来达到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罪恶目的。一当有人违反他这个路线，他就只讲为皇帝尽忠，顾不得与兄弟们讲“义”了。例如在第七十一回的菊花会上，李逵不同意宋江的招安路线，宋江立即大发雷霆，将李逵推出斩首，这哪里有半点“义气”？对一个舍命救他出法场的“结义弟兄”尚且如此，其余就更不用说了。最后便用药酒毒死李逵，这就不仅清楚地说明宋江的“义”是为“忠”服务的，而且也更彻底地暴露了宋江这个“义”的虚伪性和反动性。这样的例子，并非个别，就如第八十三回陈桥驿滴泪斩小卒，便把宋江那种牧师兼刽子手的“义”暴露无遗了。

总之，《水浒》所宣扬的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和“忠”“义”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是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是投降派宋江的理论根据，对这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我们必须加以批判。

第三讲：两个对立的典型——投降派宋江与革命派李逵

反面教材《水浒》洋洋百余万言，写了众多的人物，单是梁山泊起义军首领就写了一百〇八个。他们来自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真是五行八作，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水浒》中的人物虽然众多，但从路线上划分一下，无非是两大派：一个是以宋江为代表的投降派，一个是以李逵为代表的反对投降的革命派。

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派，其中包括三阮、吴用、张横、李俊等人，他们出身于下层社会，身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剥削，对统治阶级有刻骨的仇恨，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形成了坚决反抗地主阶级压迫的革命精神。他们“不怕官司不怕天”，敢于造反，敢于斗争。他们在革命斗争中反对投降，反对招安。他们是农民起义的真正英雄，代表了农民起义中的革命力量。

晁盖，是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人物。他领导劫取生辰纲后，因官兵追捕，放火烧了自己的庄园，和吴用、三阮等好汉一起上了梁山泊，扯旗造反。晁盖做了梁山泊的领袖之后，坚持斗争，组织力量，坚决打击“进剿”官军。他与吴用、阮氏兄弟紧密团结，屯粮造船，操练水陆兵马，积极建设山寨。在晁盖的正确领导下，梁山泊起义军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地主豪强。起义军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壮大，为梁山起义事业打下了雄厚的基础。晁盖执行的是一条正确路线，“俺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旗帜鲜明，目标明确。正因为这样，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才纷纷投向梁山泊，参加农民起义队伍，梁山泊起义军由小到大，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阮氏三兄弟出身渔户，是与晁盖一起上山造反的。他们仇恨官军，蔑视官府，为梁山革命事业出生入死，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他们主张造反，不愿投降。陈太尉来招安，阮小七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不仅让军士身带腰刀去见陈太尉，而且还放水淹船，大胆戏弄陈太尉，甚至把那招安御酒也私自喝了四瓶，剩下的六瓶分给众水手喝掉，而换上十瓶村醪白酒。什么皇帝、权贵，什么招安投降，都不放在眼里。

吴用是梁山泊起义军的军师，他对宋江的投降路线是不满的。吴用指责宋江对招安太“执迷”了。招安既成事实，宋江欢喜若狂，当即要遣送各家老小还乡。吴用却说：“未可！且留众宝眷在此山寨。”这是吴用对招安的不满和怀疑。他仍然想留一条退路，将来扯旗再干。招安后，在宋江为封建统治者出力卖命、东进西伐的日子里，吴用或是“长叹一声”，或是“低头不语”，或是“肚里沉吟”。他看到了前途之可危，招安不会有好下场。

武松、鲁智深不同于李逵、三阮、吴用。但他们仍不失为封建阶级下层吏役起来造反的英雄人物。他们对皇帝不存幻想，因而不同程度地抵制着招安投降路线。如第一次陈太尉来招安时，鲁智深“提着铁禅杖”，武松“掣出双戒刀”，“一齐发作”，不是宋江“横身在里面拦挡”，钦差陈宗善就难保性命。在菊花会上，宋江作词：“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首先惹起武松大叫：“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

混江龙李俊，船大张横，对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更是心怀不满。他们看不惯宋江那一付对朝廷权贵的媚态，所以在战斗中俘虏住官军时“唯恐宋江又放了”，干脆就在路边杀掉。

在《水浒》中，李逵是造反精神最强的一个。在李逵身上有一股“和大宋皇帝做对”的不屈的革命精神，他表现了农民阶级最本质的东西，即革命性。他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被宋江的毒酒断送了性命。加之作者本身世界观的反动，对李逵丑化污蔑，颠倒是非，使李逵成为一个被歪曲了的农民革命英雄形象。因此，我们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对李逵的革命性、局限性及作者的写作立场、观点进行全面的分析，对于深入批判《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是十分必要的。

梁山泊起义军中反对宋江投降招安的头领兵士为数不少，这是因为：起义军的成分虽然比较复杂，但大多数是被压在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封建统治者对他们进行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他们扯旗造反，参加起义军。同时，晁盖造反的革命路线曾在一个时期内是起义军内部的统治思想，反贪官又反皇帝在起义军内部有着一定的思想基础。李逵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家中有一个老母和一个靠长工挣饭吃的哥哥。阶级地位决定了他和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这是他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阶级基础。所以，闹江洲后，梁山聚义，他就第一个提出了大胆的建议：“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锋芒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这些话表明：李逵上梁山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贪官也好，皇帝也好，都是剝人民肉，喝百姓血的寄生虫，只有“杀”了他们，百姓才能“快活”。

由于李逵对贪官有着阶级仇恨，因而在起义军队伍同官军的战斗中，他表现得异常

勇猛顽强，杀得官军望风披靡，受到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晁盖的好评：此人难得啊！在攻打大地主庄园祝家庄的战斗中，宋江因“不见庄内兵马刀枪，”怕中了埋伏，丧失性命，心惊胆战地下令撤退。李逵气愤地叫道：“兵马到这里了，休要退兵，杀将过去！”这一进一退，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对的立场。李逵造反杀贪官、恶霸，是他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砍尽人间不平事，即使情况再困难，也要“杀将过去”。他曾以敢于牺牲的精神宣称：“要砍任你拿去，砍上几百刀，若要皱一下眉头就不算好汉。”这是造反的奴隶同封建统治者不共戴天的斗争精神。而宋江反贪官只不过是為了使自己获得向封建统治者讨价还价的资本，为了官爵升迁，封妻荫子，所以保命要紧。宋江与贪官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一个是既反贪官又反皇帝的造反奴隶，一个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时刻准备投降的奴才，两种斗争性质清清楚楚。

梁山起义军内部投降与反投降，招安与反招安的两条路线斗争表现的十分激烈。李逵坚持革命，反对投降，同起义军叛徒宋江针锋相对。在菊花会上，宋江赋诗明志：“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李逵立刻就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第一次代表反招安的起义军将士，对宋江的投降路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继而，陈太尉持诏书来梁山泊招安，作为农民革命的英勇战士李逵，看到革命将要夭折，更是暴发了仇恨的怒火，只见他“从梁上跳将下来，就肯让手里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大声喝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莫要来恼犯着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这时“四下大小头领，大半闹将起来，”什么天皇地玉，等级清规，在李逵的眼里就是“造反有理”。李逵代表着起义军中反招安的革命派，说出了这些起义军的心里话。

但是，在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的统治下，经过组织上的招降纳叛，思想上的“忠义”宣传后，“宋江全伙受招安”已成事实。受招安后，李逵不止一次地提出过“打回梁山泊去却不快活。”这对愈来愈深地陷入悲惨深渊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军来说，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李逵的反抗精神是不馁的，当他知道皇帝送来了药酒时，还大声喊着“反了罢！”在他的心目中，反对皇帝、打倒皇帝始终是个根本，所以在他死后，反动的皇帝在梦中还见他“抡起大斧，直径杀来。”可见，由于李逵反对招安投降，坚持革命，敢于斗争，代表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正确方向，触及了封建社会统治的根本，因而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对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提起来就心惊胆战，魂不附体。

李逵虽是农民革命的英雄，反对投降招安的英勇战士，但还有着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加之作者的丑化，这个人物被歪曲了。在梁山泊激烈的斗争中，李逵能够凭农民阶级革命的反抗精神多次向宋江的投降路线提出激烈的抗议，进行抵制。但做为封建社会的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提不出新的革命措施。另外，任何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做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的孔孟之道的“仁、义、礼、智、信”，特别是“义”的欺骗性和麻痹作用，在李逵身上的表现是十分突出的。他讲“哥们义气”，不认路线斗争，不懂得阶级分析。他只看到宋江和高俅的表面矛盾现象，没有看到这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更没有看到宋江效忠皇帝与自己要求打倒皇帝的矛盾，是农民起义军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焦点，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水火不

相容的阶级斗争。所以，即使是在将被宋江的毒酒害死之前，还对宋江抱有幻想：叫道“哥哥，反了罢！”对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直到他被毒死也不清楚：宋江的孔孟之道的“义”蒙住了他的眼睛，使他虽然能借阶级本能反招安，但对更复杂的路线斗争，对宋江的阴险内奸嘴脸始终看不清。他的悲剧就在于他吃了这种“义气”的亏，最后终于成为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

此外，李逵在梁山的地位，使他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他不当权，当权的是搞投降的宋江一伙，宋江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梁山泊占着统治地位，如乌云压城，李逵所代表的革命路线不能左右局势。当李逵提出造反时，宋江便借助他窃取的“山寨之主”的地位，威胁他，要把他推出去斩首。李逵是不屈的，但又是无能为力的。鲁迅先生说的好：“山泊中人，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事实正是如此，宋江对李逵表面亲善，实际是有切齿的仇恨的。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本来的阶级地位是对立的，他们同上梁山，但目的不同，李逵要夺“大宋皇帝”的鸟位，从根本上推翻封建统治，而宋江却是“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更主要是在现实斗争中，李逵总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因而宋江利用职权对李逵实行了地主阶级的压迫。除大家熟知的他几乎被宋江割舌、斩首、最后被毒死外，再举一例更可证明：闹江洲上梁山后，许多将领都把家眷接到了山上，李逵也下山接老母，在回山的路上，为了寻水解渴，母亲被老虎吃掉，这样一件悲痛的事，宋江一伙听罢报以捧腹大笑。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李逵这个人物在梁山泊的地位。

通读《水浒》可以深刻地感觉到，作者的感情，完全倾注在歌颂宋江的身上，而对李逵这个革命英雄，却不惜笔墨糟蹋、丑化。从肖像到性格，都进行了歪曲的描写。在肖像上说他头蓬黄发，满脸胡须，又黑又粗的身体上，发着腥汗味。性格上，粗野莽撞，胡作非为，乱砍乱杀，还用手抓饭，打起仗来上身一丝不挂。一个农民革命的英雄，被描写成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怪样。他敢于反抗的英雄气概被这些丑化的笔触涂黑了。更应该指出的是，在高俅被擒和全伙受招安的八十、八十二两回书里，是写宋江出卖革命，使梁山起义军投降受招安的大事变，革命在这两回里是彻底被葬送了，然而作者竟没让李逵出场。作者从反对农民革命、歌颂招安投降的反动主题要求出发，对李逵采取回避抹杀的手段，是很自然的。因为坚决反对招安的李逵，在这种斗争的关键时刻，会为保卫晁盖所开创的梁山革命事业奋不顾身，力挽狂澜（即使是歪曲地描写也掩盖不了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作者干脆把李逵排除在这个重大事件之外，以便情节集中，大力渲染宋江一伙顺利受招安，及招安如同节日的盛况等等，最后，竟让坚决反对招安的李逵也稀里糊涂地入城朝觐，排在队伍里，接受“鸟皇帝”的检阅。这岂不滑天下之大稽！从这里看，作者反对农民革命，丑化农民革命英雄，歌颂投降招安的反动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是何等鲜明！

李逵的革命斗争和生命终于被投降派宋江断送了，这个血的教训是应该注意总结的。

与梁山泊起义军、革命派相对立的是以宋江为代表的投降派。这些人比起梁山广大起义将士是少数，但却是梁山上层统治集团。他们出身上层社会，有豪强地主，朝廷降将，皇族后裔。他们是宋江推行投降路线的基本力量，是有权有势，能够左右局势的。

宋江把一个大名府豪强地主卢俊义连逼带骗弄上山来，并把他塞进核心领导之中，是心怀叵测的。卢出于大地主阶级本性，对梁山起义军有着刻骨仇恨，立志要梁山上“人人皆死，个个不留”，乃至狂妄地准备好一袋麻绳，以缚尽梁山好汉，剿尽杀绝。就是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坐了梁山的第二把交椅，成为宋江推行投降路线的得力副手。招安后，他东挡西杀，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在平方腊后，卢俊义的狗奴才燕青，劝其主子辞去的时候，卢却答道：“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我不曾存半点异心，朝廷如何负我？”这些话几乎全像出于宋江之口。宋、卢是形二而神一，是一对狼狈为奸、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内奸、地主阶级分子。

宋江投降派集团的另一些重要成员是朝廷降将。这些人，入伙来只是“暂占水泊，权时避难”的。当宋江对他们“亲手解缚”，“纳头便拜”的时刻，答应下来的入伙条件就是“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这些人损兵折将，回朝也是被问罪，倒不如“暂占梁山”，以图再起。他们在梁山都居“五虎将”“八骠骑”之要职，诸如关胜、呼延灼、秦明、张清、董平、徐宁、索超等，都是这样一批“身在梁山，心怀朝廷”的人物，他们对宋江的投降路线是言听计从，从不抵制，而且屠杀有功，大效鞍马之劳，为招安创造条件。

其他如王族后裔柴进，大地主李应之流，是因统治阶级内部倾轧，吃了官司，几乎丧命，上山后又都是“叫苦”不迭的人物。这些贵族、地主与梁山农民起义军能有什么共同的思想感情！可是，这俩人却是掌管梁山钱、粮大权的头领。宋江推行投降路线的阶级基础，只能是这些降将、地主、贵族，自然都要委以重任。有钱、有粮、有人，有枪，宋江才能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大搞其投降活动。在这些投降派人物中，宋江则是《水浒》全力美化、歌颂的典型。

宋江是《水浒》中的中心人物。对宋江这个人物，作者呕心沥血，极力把他描绘成“济人贫苦，赍人之急，扶人之困”，“能救万物”的“及时雨”。作者还把宋江精心粉饰、竭力美化为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但正如斯大林指出的：“乌鸦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可是乌鸦毕竟是乌鸦。”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宋江其人进行全面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不管作者怎样为他涂脂抹粉，《水浒》中的宋江仍然是一个十足的投降派，出卖农民起义队伍的叛徒、内奸。

宋江出身地主家庭。他“广有庄客”，“钱帛”，看来是一个不小的地主。凭着“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做了郓城县押司，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爪牙。他“自幼学儒”，“曾攻经史”，是孔孟之道的信徒；言必“忠君”，行必“孝亲”，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政治上，他一心沿着仕途往上爬，上梁山后，他拼命鼓吹“造反有罪”，宣扬“投降有理”，竭力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最后葬送了轰轰烈烈梁山农民革命。综观宋江的一生，是叛徒的一生，是反革命的一生。

“暂占水泊” 投机革命

毛主席深刻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

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受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熏陶的宋江，全身浸透了“忠、孝、仁、义、礼、智、信”等腐朽的孔孟之道。他立志要做“保国安民”、“尽忠报国”的忠臣，他所追求的是“官爵升迁”、“封妻荫子”、“青史留名”，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效劳。这样一个公然声称“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是怎么上的梁山呢？原来，宋江虽凭一时的“哥们儿义气”，私放了晁盖等劫取生辰纲的英雄，但他却认为，晁盖众人劫取梁中书给蔡太师的生辰纲，杀死公人，损害官厅的军马，活捉黄安等一系列革命行动，是“犯了弥天大罪”，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当宋江为灭口，杀了人，遭到官府追捕，他先投王爷嫡系子孙柴进，又靠大地主孔太公，再到花荣官寨，根本没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去梁山“落草为寇。”梁山泊起义军劫取了押送宋江的公人，遂宋江留在山寨共同聚义。宋江却说：“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万劫沉埋。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

宋江不准备上梁山，做那“上逆天理，下违父教”、“不忠不孝”的人。仍想通过忍耐赎罪后，讨得主子宽恕，继续沿着顺民和忠臣的道路，一步步往上爬。没想到在刺配江州之后，因满腹牢骚，醉题“反诗”，触怒统治者，被绑赴刑场。在刀压脖子的时候，要么立做刀下鬼，要么就得上梁山。所以，宋江上梁山并不是投身于农民革命，而是“暂占水泊，权时避难”，等待时机，“报效朝廷”。他始终认为上梁山是“造恶甚多”，一直怀着诚惶诚恐而又焦灼的心情，等待皇帝赦罪招安。这便是宋江被迫上山和上山后时时准备接受招安的思想基础。

大搞投降，贩卖革命

宋江是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内奸的典型。

梁山泊农民起义军，在以晁盖为代表，大造封建王朝的反，“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从劫取皇廷、贪官污吏的“不义之财”，到直捣他们的安乐窝，如“攻高唐”、“打青州”、三打祝家庄等战役，都狠狠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大长了起义军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梁山泊革命起义军的队伍一天天壮大。“撞破天罗归水泊，掀开地网上梁山”。革命的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

晁盖是梁山农民起义军革命路线的奠基人，也是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最大障碍。一切投降派，要搞反革命，就要搞阴谋诡计，就要搞分裂，要尽两面三刀手法。宋江上山不久，就给了晁盖一个软钉子：晁盖要杀掉无端杀人放火的杨雄、石秀，宋江马上出面，假仁假义地劝解、阻拦，又圆通地向杨、石解释说，这样做不是晁盖大王故意刁难，而是“山寨之规”不得违犯。如此做法，既买了双方人情，又不露痕迹地贬低了晁盖，宋江就这样施展了反革命两面派伎俩。表面上，他对晁盖是甜言蜜语，左一个亲哥哥，右一个好大王，好话说尽，表示忠心耿耿，而实际上却要事事出头，争取主动。山寨几次商议军事行动，宋江不等晁盖开口，抢先指指点点，并上窜下跳地争着奔赴战场，以此显示自己，架空晁盖。晁盖对此也有所察觉，一次梁山泊准备攻打青州，宋江